

特約稿

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

曹淑娟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唐代碑刻文化鼎盛，同時也是中國園林發展史上重要轉折階段，由貴族莊園逐漸發展出文人園林的主流型態。在發展過程中，園亭相關書寫結合立碑刻石的行動，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出現於大地之上，成為被注目的對象，也引動視覺景觀的變化與意義詮釋。

本文嘗試聚焦於此類詩文碑刻如何經由書寫與詮釋，參與地方經驗的形塑。選取三則具代表性的事例，分別論述其中涉及的三個面向問題。首先以王仲舒的燕喜亭為例，觀察韓愈撰述的記文文本如何與碑刻結合，詮釋造亭者與地方的性質，進而成為意義中心。韓愈的書寫經驗與王仲舒的開闢經驗一同進入燕喜亭，引動後人對燕喜亭乃至連州的記憶。其次，以元結的浯溪為例，觀察元結如何選擇浯溪水石營造小園，書銘刻石。進而聚集佈列多元性質的刻石，以崖石上的文字詮釋自我與時代，並開放向未來的讀者，終而塑造摩崖石刻的地景，建構出後人多方應和的互文世界。再次，以樊宗師的絳守居園池為例，觀察樊宗師來守絳州，在官署園池上撰記、立碑、作注，進行地方歷史和景觀的書寫，而他的獨特文體與書寫方式，創造了絳守居園池的能見度，成為絳州一道令人注目的文本景觀，召喚後人來作詮釋。

關鍵詞：碑刻 地方書寫 韓愈 元結 樊宗師

* 本文為執行專題計畫「唐代園林書寫中的技藝、官亭與碑刻」（計畫編號：MOST101-2410-H-002-132-MY3）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科技部持續補助，筆者得以長期耕耘，謹此誌謝。

特約稿

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

曹淑娟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中國碑刻文化濫觴於先秦，傳說起源甚早，《文心雕龍·誄碑》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封禪、紀跡，具體發生的事跡雖難考辨，然已透露碑之為物結合著事件與文字的屬性。

在可考文獻中，碑之早期性質與「庸器」有關，施用於禮儀的場合。或言葬禮場合，下棺繚繞之木碑，^①或指祭祀場合廟門旁立繫牲之碑，^②或指宮庭上樹碑以識日影之用。^③它們後來與紀功頌德之立石、刻石逐漸合流，從與禮儀相關的一種物質形式和行為方式，慢慢發展出結合石刻內容的一種文本形式。依程章燦先生觀察，從秦漢至唐之間碑文體演變之大趨勢為：從碑石、碑頌、碑傳到碑文。漢碑可依功能劃分為祭祀封禪碑、紀功頌德碑和墓碑等幾大類，施用對象雖有山

①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檀弓下》：「公室視豐碑」(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鄭注：「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繚繞。」，卷10，頁188。

②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鄭注：「麗，猶繫也。」，卷47，頁812。

③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聘禮》：「上當碑南陳。」(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鄭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卷21，頁255。

川宮廟、祖先古聖神靈與個別人物之不同，整體而言，雅頌之體為漢碑主流，有較強的公共性和集體性。至漢末冢墓碑的影響日益擴大，抒情性和個人化逐漸增強，魏晉南北朝人逐漸形成了「碑者，悲也」之文體觀念。也因私碑的盛行，魏晉南北朝時多次禁碑，間接促成墓誌文體在東晉南朝之際出現，以略有異同的物質形態和文本形式，滿足當時人們對私碑的需求。^④

至於唐代，碑文墓誌刻石等制作風氣愈加興盛，帝王往往親撰或親書碑文刻石，^⑤頌功述志、紀人銘鐘，兼及政治、宗教、教化各領域，其中如詩碑、賜敕等主題已開新局。士臣百姓書碑勒石，亦蔚然成風，著名文士接受請託撰寫墓誌，數量與酬金往往可觀。如李邕（678-747）善書，為人撰書碑銘八百多方，所受餽遺，累至鉅萬^⑥。白居易（772-846）為元稹（779-831）撰墓誌文，元家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屬，價當六七十萬，白居易悉以布施修香山寺。^⑦韓愈（768-824）碑誌文奇崛險譎，^⑧敘事中兼作議論，善於利用對話與人稱轉化，成為新的典範。^⑨劉禹錫（772-842）言其「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⑩凡此現象反映出唐人喜好碑刻的風氣，以及碑刻的文本性質已獲得高度

④ 程章燦：〈從碑石、碑頌、碑傳到碑文--論漢唐之間碑文體演變之大趨勢〉，《唐研究》第13卷（2007年），頁419-436。

⑤ 金其禎：〈唐代碑文化研究〉，《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2004年），頁49-60。

⑥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李邕傳》：「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190，頁5043。

⑦ （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記〉，（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68，頁3689-3690。

⑧ （明）茅坤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道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83冊），頁1a。

⑨ 葉國良曾深入觀察分析韓愈冢墓碑誌文在題、序、銘三部分的行文特色，請參見葉國良：〈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石學蠡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47-99。

⑩ （唐）劉禹錫：〈祭吏部韓侍郎文〉，（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109-3110。

重視，墓誌與銘、頌等碑刻文本，成為流行的文學體類，¹¹文學、書法與雕刻藝術相互結合，提供文士藝文創造力馳騁的場域。

碑刻文化鼎盛的唐代，同時也是中國園林發展史上由貴族莊園轉型為文人園林的發展階段，¹²這些結合立碑刻石行動的文本書寫進入園林之中，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出現於大地之上，成為被注目的對象，是否也引動視覺景觀的變化與意義詮釋？此為本文撰作動機。

雖然今存唐代文獻中直接論述園林觀念與建設的材料不多，但由詩文、筆記中仍可見出唐人興建園林的風氣。他們或者繼承六朝莊園形式而發展田園之思，如王維的輞川別業；或者在城內宅第中營造自足自樂的私人天地，如白居易的履道園池；或者因宦跡所及，截取一段自然山川，飾以亭、堂等簡單工事而自成佳景，如瞿令問的寒亭、柳宗元的愚溪、薛存義的零陵三亭、白居易的廬山草堂等。它們沒有明確的共同模式，名稱也十分多元，反映了發展中的樣貌，本文統稱之以園亭，期能更相應於這些多元發展的空間特質。在這些唐人園亭的相關書寫中，往往可見「刻石以記」、「書於石」等標記，透露了園亭興造、書寫與碑刻行為之間的聯結關係。¹³這些書寫詩文的園亭立石或刻石，在繼承碑刻傳統中是否有新

¹¹ 劉勰文體論雖分立〈頌讚〉、〈銘箴〉、〈誄碑〉等篇，然已有見於文類界限的模糊，是以反覆比勘，言其分合。如〈頌讚〉篇言頌「美盛德而述形容」，「頌惟典雅，辭必清縑，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銘箴〉云：「銘題於器」、「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誄碑〉篇則指出：碑之文體「其序則傳，其文則銘」，「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唐寫本作「先」為宜）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唐寫本作「亡」為宜）者，同誄之區焉。」分見（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卷2，頁156、158；卷3，頁195、214-215。唐代亦往往可見此等文類彼此間相互滲透的現象，也表現在本文所論立碑刻石的文學活動中。

¹² 中國園林史的發展請參見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漢寶德：《物象與心境--中國的園林》（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0年）等書。唐代園林之整體觀察，可參見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¹³ 朱劍心分古代石刻為十一種：刻石、碑碣、墓志、塔銘、浮圖、經幢、造像、石闕、摩崖、買地券。朱劍心：《金石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171。其中與園亭有關的形式主要為刻石、碑碣與摩崖。

的轉折開展？詩文作為文本形式與立石刻石的行為方式之間關係若何？唐人作過哪些思索判斷與實踐？應是值得深入觀察的議題。¹⁴

本文嘗試聚焦於詩文藉由碑刻的形式進入園亭，如何結合文字文本與碑石的物質性呈現視覺景觀與意義詮釋，參與地方經驗的形塑。選取三則具代表性的事例，分別論述其中涉及的三個面向問題。首先以王仲舒（762-823）的燕喜亭為例，觀察韓愈撰述的記文文本如何與碑刻結合，詮釋造亭者與地方的性質，從而成為意義中心，韓愈的書寫經驗與王仲舒的開闢經驗一同進入燕喜亭，引動後人對燕喜亭乃至連州的記憶。其次，以元結（719?-772）的浯溪為例，觀察他如何選擇浯溪水石營造小園，書銘刻石，進而聚集佈列多元性質的刻石，塑造摩崖石刻的地景，以崖石上的文字詮釋自我與時代，開放向未來的讀者，終而建構出後人多方應和的互文世界。再次，以樊宗師（?-?）的絳守居園池為例，觀察樊宗師來守絳州，在前人已開闢的官署園池上撰記、立碑、作注，進行地方歷史和景觀的書寫，而他的獨特文體與書寫方式，創造了絳守居園池的能見度，成為絳州一道令人注目的文本景觀，召喚後人來作詮釋。

二、韓愈與燕喜亭——碑刻與文本共構的地方記憶

唐代中後期文士貶謫南遷，往往開展出山水遊觀的行動和論述，¹⁵柳宗元（773-819）因王叔文事件貶謫永州司馬，而有大量山水記的寫作最受後人注目。柳氏發現永州幽遠之境以舒放謫囚心態，感嘆山水亦有際遇問題，自記其景與事，

¹⁴ 學界討論園林碑刻者尚鮮，然有關碑刻文化的論述，對筆者多所助益，如前述葉國良先生：《石學蠡探》；李慧、王曉勇：《唐碑漢刻的文化視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程章燦：〈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學術研究》2013年第10期（2013年），頁127-136；程章燦：〈景物：石刻作為空間景觀與文本景觀〉，《古典文獻研究》第17輯下卷（2014年），頁1-28。

¹⁵ 學界就此相關問題已多所論述，如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蜀蕙：〈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述〉，收於《唐代文學研究》13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59。

託之文字以助傳揚。¹⁶諸記寫其如何發現西山、鈷鋤潭、潭西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小石城山，如何經由「斫榛莽，焚茅筏」、「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伐竹取道」、「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等行動，發掘出諸地向來被隱蔽的美。¹⁷柳氏的際遇與詩文固然流溢個人生命的悲情，同時也反映出中唐大量南謫文士的類似心境。早他二年貶謫連州的王仲舒也有一段發現謫地美景的經驗。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以德行、文章知名，頗為時人敬重。¹⁸貞元十九年（803）九月，王氏由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同年十二月韓愈也貶謫陽山令，為連州屬邑。連州在南方僻遠之地，王仲舒雖未留下詩文自述心境，但由韓愈執筆之〈燕喜亭記〉，則記錄他出遊謫地山水、開發美景的經過：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櫛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闕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¹⁹

¹⁶ 柳氏諸記皆有此意，其中〈鈷鋤潭西小丘記〉云：「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石渠記〉云：「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二文可能都刊刻石上，以訴諸更廣泛與長久的流傳。

¹⁷ 請參見（日）學者清水茂先生撰，華岳節譯：〈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文中闡述柳宗元山水記著意發現被隱蔽了的美而認識其價值，收於羅聯添先生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頁1049-1072。另可參見許東海：〈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政大中文學報》NO.1（2004年06月），頁75-112。

¹⁸ 王仲舒生平詳見（唐）韓愈〈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2610-2612。

¹⁹ （唐）韓愈：〈燕喜亭記〉，作於貞元二十年（804）。（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1632-1633。下文再次徵引，為免繁瑣，將不另作註。

王弘中常與學佛人景常、元惠相偕出遊，²⁰偶然發現其居所後之荒丘蘊藏美景，於是斬茅發石，輦糞壤，燔榴翳，整治之後，林木嘉美，水泉清冽，地貌變化豐富，令人流連忘返，因而立屋以供居留。王氏不自撰亭記，委由同謫連州的韓愈為其命名並書寫記文。韓愈原未參與王弘中的出遊與整治環境的活動，受邀撰記，卻積極主導了觀看其人其地的角度。〈燕喜亭記〉在內容上追溯王氏貶謫途程，轉化為磨鍊仁智的過程；並藉由命名，賦予地方景象儒家倫理意涵。記文撰成付之刻石，則以二種文本形式成為燕喜亭與連州的導覽者。韓愈雖未參與造亭活動，卻藉由書寫形塑燕喜亭的地方意義，與之建立緊密連結，成為後人對此地記憶的重要內容。嘗試梳理如下。

（一）追溯王氏貶謫途程，轉化為磨鍊仁智的過程

「記」之為體，以敘事為正，明人吳訥、徐師曾討論記體時，皆曾指出韓愈之記，記其事耳，〈燕喜亭記〉雖微載議論於中，仍為正體。²¹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如何藉由微載議論於敘事中，擴大了敘事的指涉功能，由外顯行動彰顯人物的內在性質。記文中除記敘王弘中與景常、元惠整地立亭的過程外，韓愈並歷數王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所經途程：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嶺，蟻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²⁰ 韓愈集中有〈送惠師〉，惠師即元惠，疑即此文之元慧。〈送靈師〉云「落落王員外，爭迎獲其先」，王員外即指仲舒，可見在連州與王仲舒及方外友交遊情形。

²¹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泰順書局，1973年），頁41-42。（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臺北：泰順書局，1973年），頁145。

從長安出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繇郴「踰」嶺，最終南抵遐方連州。這其實也是韓愈自身南謫行走過的路線，是以得以娓娓細數，流露最深的相知與共感。貞元十九年（803），王叔文、韋執誼集團勢力方熾，因疑右補闕張正買上疏論諫其朋黨事，因譖正買等，九月，王弘中坐與正買善，由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同年十二月韓愈也因上書言事貶謫陽山令，²²他們走著同一條斥逐之路，來到陌生的遠方。一連串的動詞連綴而下，出以三言單式句型，帶有連續流動的語勢，既是負譴而來不可拂逆的命運，卻也因動詞居前，主詞省略，儼然也有「我」作為潛在主詞的可能性，於是，允許了韓愈進行意義的轉化。從政治處境來看，它是貶謫行旅的歷程，被動地跋涉山水，走向荒陬。從山水遊歷來看，它是親臨現場，深入體察自然山水的過程，「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從生命鍛鍊來看，它更是擴大閱歷、磨勵自我器識能力的過程，王弘中觀覽山川之瑰詭險夷，同時也益加磨練出了發現被隱蔽之美的能力，是以來到連州，不陷溺在自己才質之美被隱蔽揚棄的憂傷，與學佛人交游，進而主動發掘荒丘，藉由積極的整治工程，成就了燕喜亭的美好景觀。韓愈援引傳統「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語，推進一步指出王氏「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強調其自覺主動的規劃實踐行動超越常人。所以文中藉由州民老者之口稱頌王弘中：

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其他人經營山水之地，而未發現亭之所在的美好，以其缺乏鑒識能力與行動成效。由此再聯結其文中以山水品格象徵士人品格的思路，則燕喜亭不止於彰顯王弘中的君子之德，同時也隱含了王氏化被動為主動，擴大閱歷、涵養器識，從中增強

²² 參見（唐）韓愈撰，（宋）魏仲舉輯注：《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卷13，頁14b。

了鑒別人才、謀劃朝政的能力，是以推論「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後來王氏之政治能力果然得到重視，累任要職，也證實了韓愈品鑒人才之能力。²³

（二）藉由命名，賦予景象儒家倫理意涵

建設既成，韓愈總名之曰「燕喜之亭」，並為分景一一命名：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竦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竦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

中唐時期園林分景概念初步發展，尚未十分成熟，王弘中「燕喜之亭」的整體空間規劃並不清楚，前段所云「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闕者為洞」固然十分粗略，此段指出有丘、石谷、土谷、洞等地勢變化，瀑、池、泉等水景，以及可避風雨之建築，也只是列出樸實的景象要素，並未多留意各種要素所構成的景面，以及彼此之間的聯結關係等園林美學面向。蓋景象美學恐非韓愈之所長，也非他的關懷所在。

陳幼石先生觀察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送李愿歸盤谷序〉、〈平淮西碑〉、〈柳州羅池廟碑〉等文，曾指出韓愈提倡文學的教育意義，擅長於靈活轉變作品的主題，成功地將各種題材的創作旨意指向儒學，將文學創作歸入儒學體系。²⁴筆者認為〈燕喜亭記〉同樣也體現了此一傾向，在中唐亭臺記盛行的風潮

²³ 王氏仕途固多起伏，然才德漸受朝廷肯定，累遷吏部員外郎、職方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等。王氏逝於長慶三年，韓愈為撰墓誌銘與神道碑銘，分見（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 2610-2612、2621-2624。

²⁴ 陳幼石：〈韓愈「道」、「文」的復古與正統的建立〉，《韓柳歐蘇古文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一章，頁 1-39。

中，他將偶一撰寫的〈燕喜亭記〉收編進他的書寫系統，也成為宣揚他的儒學關懷的載體，貫徹其學術主張。他以儒家人格象徵為主要取義，為景象個別命名，用以彰顯王弘中的人格修養。荒丘昔日長期不為人知，等待著被發現遮蔽的美，如君子有俟時之道，故名「蒞德之丘」，呼應屈原被放「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蒞時乎吾將刈」之句。²⁵「謙受之谷」出自《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²⁶以言人之虛懷若谷，「振鷺之瀑」出自《詩經·周頌·振鷺》：「振鷺于飛，於彼西雝。」或《魯頌·有駟》：「振振鷺，鷺於下。」²⁷取白鷺潔白毛色喻在朝操行純治之賢人。「秩秩之瀑」出自《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²⁸言水流清澈、流行有序。此外，「寒居之洞」記其遠謫來此之時正當歲寒，「君子之池」表彰虛以納美、盈以出惡的德行，「天澤之泉」稱美禮賢下士、仁煦待物的胸襟；種種景象說明完全扣緊君子之德而發言，既以山水景象象徵王氏人物高品，又以山水未遇王氏之前的隱伏未發，來象徵王氏今日之暫時受困以蒞時。最後總名「燕喜之亭」，出自《詩經·魯頌·閟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²⁹取其上下安康喜樂之意，就個人生活而言，王弘中樂與學佛人交遊，樂於發掘美景，晨往而夕忘歸；就官吏身分而言，王氏也獲得村民父老愛戴。「燕喜」既讚頌他能固窮自適，同時也祝福他能官民和諧共樂。

（三）撰記刻石，以二種文本形式成為燕喜亭／連州的導覽者

韓愈〈燕喜亭記〉撰成後，「遂刻石以記」，因而記文有了不同的物質載體，一為竹帛傳抄流佈，一為安置於連州現場的石刻記文。石刻〈燕喜亭記〉兼有物

²⁵ (宋)朱熹集注：《楚辭集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卷1，頁7。

²⁶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大禹謨〉，卷4，頁14a，總頁58。

²⁷ (漢)毛亨注，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周頌·振鷺》，卷19-3，頁2a，總頁730；《魯頌·有駟》，卷20-1，頁12b，總頁766。

²⁸ 同前註，《小雅·斯干》，卷11-2，頁3b，總頁384。

²⁹ 同前註，《魯頌·閟宮》，卷20-2，頁14b，總頁782。

質形式與文本形式：既以碑石的材質、形制、裝飾結合文字書法藝術，共同組成爲被觀看的風景，可與「嫉德之丘」、「謙受之谷」、「振鷺之瀑」、「黃金之谷」、「秩秩之瀑」、「寒居之洞」、「君子之池」等並列，加入燕喜亭的全體景象之中；而其文本又提供來遊者觀看現場景象的角度，起著解讀這片空間意涵的引導作用，甚至於因爲五經石刻的歷史聯想，還帶有指點導讀的權威性。有趣的是，這份權威性也附著在其他傳抄流佈的文本上，隨著韓愈日高的聲名與地位，發揮極大的傳播功能，成爲異地讀者想像遙遠的連州山水與燕喜亭的憑藉。

據韓愈外孫李貺的觀察，除了自己因家世關係，自幼即已習讀〈燕喜亭記〉，而知連州山水之殊。當時中原人士也是通過此記而對連州山水印象深刻：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之殊，亭之稱，因記爲天下所嘉。連爲郡，既遠且秀，亦因亭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既以連遐遠，不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爲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到焉。³⁰

文中透露出的訊息饒堪玩味，韓愈當年爲王弘中撰寫〈燕喜亭記〉，他的身份只是一位相知的舊友和偶遊的來客，以命名和記文爲王氏的整治活動進行詮釋，彰顯王氏的君子之德，並祝福其早日重返中原。但在李貺和他所反映的「中州人」的閱讀視野裡，韓愈撰記刻石的行動和文本中描繪山水景觀的局部內容被選擇強調，王弘中的身影相對淡出。燕喜亭因韓愈撰刻〈燕喜亭記〉而傳播佳名，連州亦因燕喜亭而提高了在州郡山水排行榜上的名次，成爲天下山水可娛的選項之一。連州地處邊陲，中州之人不易來遊，真正爲連州和燕喜亭發揮傳播作用的，不是刻石的物質形式，而是傳抄或者拓印之〈燕喜亭記〉，提供賞好山水之人「目登心到」的臥遊憑藉，甚至成爲畫家工師繪畫連州山水圖的依憑。但是，細究其實，韓愈〈燕喜亭記〉中描述連州山水之文字，如「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³⁰ (唐)李貺：〈連山燕喜亭後記〉，收入(清)董誥等輯：《欽定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642冊)，卷494，頁655-656。以下簡稱《全唐文》。

「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闕者爲洞」，皆非實景描繪，只是地勢起伏的概括性勾勒，所謂「依記以圖，爲館宇飾」，圖繪者想像的連州山水想必面貌各殊，其中足以作爲連州地景標誌者，恐怕唯有燕喜亭與亭記刻石。

李貺作爲〈燕喜亭記〉的異地讀者之一，閱讀的並非石刻文本，但在他的閱讀視野裡，〈燕喜亭記〉刻石的物質形式是與燕喜亭的建築和山水緊密聯結在一起的。當會昌三年（843），李貺陪侍其父李漢南謫來到連州，³¹特意訪尋燕喜亭，以爲「昔聞今見必矣」，可以說是帶著文本形式的〈燕喜亭記〉來與物質形式的亭記刻石相認，卻發現已無遺跡可尋。所以發出「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昔奚寵遇而讚詠之如彼，今遭何人廢棄之如此，豈亭之屯耶」的嘆息。

數月後，刺史武興宗到任，也認同了這份嘆息，於斷垣頽壁中重修燕喜亭與韓碑，並命李貺再撰新記以記此變動之跡：

刺史武公至，歎之尤甚，且曰：「不脩，則過及余矣。」遽揮徒而窮尋之，冒翳履淖，抵巇攀蔓，得餘趾焉。級磚缺擲，棟椽垣瓦，寸折片碎，翦汗其甚，石記斷僵，莓昧其字。公整而脩之，徵記本於余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矣，於舊不移不損，煥而為新。

武興宗指揮部屬於亂石泥淖、荊蔓蒙翳中發現遺址，不唯燕喜亭已然傾圮，棟椽垣瓦，寸折片碎，即〈燕喜亭記〉碑石亦已毀斷，字跡模糊不可辨識。此時距離〈燕喜亭記〉撰記立石之貞元十九年（803），不過四十餘年，已然是滄桑轉換。此中並形成一層弔詭：刻石以記，原欲以石之堅硬對抗時間的變動，使亭記文字與記事獲得更高的傳世保障，但是事實卻是：記文經由傳鈔拓印流播，反而得以傳揚於不同時空，所以李貺家藏是文之鈔本，自幼即曾誦讀。中原人士更輾轉傳鈔口誦，甚至依記以圖，再生產爲圖繪創作。反是連州的石刻伴隨亭景而隳敗。武興宗整修燕喜亭，並重刻韓氏之記，即從李貺家徵求亭記之文本原文，另覓石

³¹ 李漢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其子李德裕惡之。李德裕輔政時，出為汾州刺史、司馬。太和九年（835）八月，與楊虞卿、蕭瀚皆再貶，甚至下令二十年內不得用。

材而重作雕琢刻鏤，於是燕喜亭與亭記刻石煥然一新。

李貺的〈連山燕喜亭後記〉同樣刻石於重修後的燕喜亭，與韓愈〈燕喜亭記〉並置。二份刻石在靜默中，訴說著祖孫先後南來，見證燕喜亭的初建與重修。韓愈與燕喜亭的聯結得到了強調初建之時，韓愈原為偶一來遊的客人；重修之際，因李貺的追尋，重新選擇建構燕喜亭歷史的觀察脈絡，韓愈的身影易客為主，成為追憶的焦點所在。

（四）碑與亭提供後人具體撫觸追思的憑藉

茲後，燕喜亭屢經興廢，成為連州古蹟之一，後人往往即將亭記石刻一起納入園亭空間景觀之中，也將韓愈的作記刻石納入燕喜亭的人文歷史之中。刻石雖不免頹壞的過程，但它的物質性提供後人追憶的憑藉，縱使碑殘亭荒，仍是一段佈滿時空印痕的斷片，提供與案頭文本有別的閱讀經驗。今存與燕喜亭相關之文獻，往往可見連結著連州現場的憑吊行動。如北宋思想家周敦頤來遊，手書「廉泉之源」，取義於韓愈「君子之池」、「天澤之泉」等景象命名。稍後之向宗道、陸琮、金傑、王純中、朱誥，南宋紹興時宰相張浚、張栻父子等人，或攜家來遊，或與同僚友人同行，皆來訪覽前代遺跡，並以題名刻石表達對於此地地方記憶的珍惜。⁶²亭與石也迭經重修，元豐初年燕喜亭已與連州其他亭、閣、樓合稱十二亭，紹熙間州牧陳奕重立十二亭，唯燕喜亭不變，他如飛源亭、君子亭、天澤亭，皆典出於韓愈記文，將記文中的概念具象化為物質性的景象。⁶³

在後人追憶中，韓愈與王弘中的輕重比較有時成為關懷話題，嘉靖十四年（1535）余勉學重修燕喜亭，請李壯義撰重修記，自比王弘中，而比李於韓愈，李氏由「余未有得于韓，然宏中子非耦也」切入，申論韓愈寄予王弘中厚望，而

⁶²（清）楊楚枝修，吳光纂：《（乾隆）連州志》〈古蹟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廣東府州縣志》第六冊），卷6，頁26b-28a，總頁402-403。於「燕喜亭」條下附載亭前石上前賢題字十一條，宋人題石9則，明人題石二則。

⁶³同前註，「元豐十二亭」、「紹興十二亭」條。

弘中未能稱是，最後推出「使無韓之記，吾恐此亭與宏中敝也久矣」，³⁴表現揚韓抑王之意。入清後之參與重修者，往往也延續此一話題，王濟民於康熙 41 年（1702）重建燕喜亭，詩云：「北山遺舊蹟，世遠尙堪新。斬棘開荒址，臨風慕古人。閒情聊可憩，勝覽不辭頻。千載心潛契，先賢啓後塵。」³⁵所嚮往之「先賢」，尙包括王弘中與韓愈。其後陶德燾自記重修工程云：「癸丑冬立屋既成，嘉樹復列，亦曰斬茅清泉自激，亦曰發石於其屋之中，鐫燕喜亭記於碑。蓋昌黎公文章天作而地藏之，太原所好不足論也。」³⁶王丕烈爲作〈燕喜亭跋〉云：「亭之建昉於唐之王宏中，自昌黎爲之記，遂足千古，傳不以宏中，以昌黎也。」³⁷更直接指明亭所以傳世，蓋以昌黎撰記而非宏中之興造。

夏之蓉〈遊燕喜亭〉詩云：「退之有碑記，代遠猶星懸。」³⁸沈大成〈遊燕喜亭用東坡先生東湖詩韻〉：「韓公留鴻筆，大氣猶負涵。」³⁹翁方綱〈燕喜亭次石上韻二首〉：「借他亭子稱韓子，空付遊人坐日斜。」⁴⁰程頌萬〈尋燕喜亭遺跡〉：「草沒韓碑扶蠹鼠，花開秦戍變圖經。」⁴¹李調元〈連州牧張玉峯利仁邀遊燕喜亭得序字〉所作長序亦是由韓愈的命名作記回憶燕喜亭的歷史。⁴²皆可見出韓愈作記刻石與燕喜亭形成的緊密聯結。

³⁴（明）李壯義：〈重修燕喜亭記〉，（清）楊楚枝修，吳光纂：《（乾隆）連州志》，〈藝文志〉，卷 10，頁 24b-26a。總頁 465-466。

³⁵（清）王濟民：〈重建燕喜亭并序〉，同前註，卷 11，頁 22a，總頁 498。

³⁶（清）陶德燾：〈燕喜亭記後跋〉，同前註，卷 12，頁 9b-10a，總頁 510-511。

³⁷（清）王丕烈：〈燕喜亭跋〉，同前註，頁 9a-9b，總頁 510。

³⁸（清）夏之蓉：《半舫齋編年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287，影印清乾隆 36 年刻本），卷 9，頁 3a，總頁 710。

³⁹（清）沈大成：《學福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428，影印復旦大學館藏清乾隆 39 年刻本），卷 7，頁 4b-5a，總頁 289。

⁴⁰（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454，影印清刻本），卷 8，頁 14a-14b，總頁 433。

⁴¹（清）程頌萬：《楚望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557，影印復旦大學館藏清光緒 27 年刻本），卷 8，頁 11b，總頁 228。

⁴²（清）李調元：《童山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叢書集成初編》），卷 21，頁 277。

夏之蓉〈重修燕喜亭序〉更深刻思考今日重修之意義，指出後人追憶由亭而記而人之轉移。文云：「歲久頹廢，邦之士大夫從而加振興焉。是舉也，吾不知其爲亭存乎？爲記存乎？如其爲記存也，則文章洵有靈哉。」下文即朝「爲記存也」發揮：

夫士當失意時，出入於讒邪忌嫉之途，而寢息乎羈愁頓踣之域，即作為文章，世方夷之藥籠醬瓿而不惜，迨其久，而光怪陸離之氣卒不可磨滅，則殘碑斷碣，雖婦人稚子之無知，猶將拂拭而摩挲之，況其爲學士大夫者乎。⁴³

由痛惜羈愁頓踣之失意文士文章易於流失，轉而以「殘碑斷碣」聯結其「光怪陸離之氣卒不可磨滅」，碑碣的物質性可以具體撫觸摩挲，殘斷的現象訴說著時間的推移，尤能發思古幽情，用以解釋燕喜亭之歷久必新。然後再進一步歸結於「亭以文重也，文亦以人重」，引導時人登亭讀記，「當慨焉想見其人與其所以爲政」，並將原指向王弘中人品宦績的描述投映於韓愈自身，聯結韓愈立朝強諫、力諍大節的人品，以及貶謫陽山令而饒有惠政的政績。

經由前文分析，清楚可見亭記刻石結合文本與物質的雙重性質，在斷裂與重修的過程中，既參與進燕喜園亭的興衰歷史，又提供了後人追憶、重修與認取意義的主要依憑。於是王弘中的選址、造亭，韓愈的命名、作記與刻石，二人南謫連州的政治經驗、道德人品，以及後人的重修行動與撰作新記，在時間進程中相互聯結召喚，同體共構了燕喜亭的文化記憶。

三、元結浯溪刻石——叢聚景觀的形成與地景塑造

唐代園林已超越早期園林景象各自孤立、功能單一的現象，⁴⁴逐漸發展分景概

⁴³ (清)夏之蓉：《半舫齋古文》（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9輯26冊，影清乾隆刻本），卷5，頁12a-13a。夏氏為雍正11年（1733）進士，乾隆元年（1736）博學宏辭，於乾隆10年（1745）授廣東學政，本文或作於此時。

⁴⁴ 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頁52。

念。王維有別業在輞川山谷，《輞川集》記存其遊止所賦之二十景絕句，部分學者視為以分景為單位經營園林佈局的開創者，反映出王維對游止空間的整體佈局有所掌握。⁴⁵白居易江州時期的廬山草堂未刻意標示分景，但草堂三間、堂東瀑布、堂西簷溜的引水設計，配合堂前小池的開鑿，實已蘊含分景佈局的能力。⁴⁶後來經營洛陽履道園，書庫、琴亭、小灘、小澗、青板舫、太湖石也標示了幾個重要分景，並在全園景象命意上起重要作用。⁴⁷早於白居易的元結對浯溪水石的經營也呈現分景佈列的能力。

元結約於廣德元年（763）至大歷三年（768）間兩任道州刺史，道州原苦於盜賊，居民逃難外流，地貧人稀。元結善施仁政，極得民心，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⁴⁸地方既治，元結亦好遊山水，遂於相鄰之永州發現浯溪風景，於大歷二、三年間略作整治，處理平臺，修建小堂，先後撰寫〈浯溪銘〉、〈岵臺銘〉、〈唐廡銘〉，由瞿令問等人書鏤於浯溪石壁。並從道州移刻〈窳尊銘〉、〈窳尊石〉詩。大歷四年（769）因母喪返浯溪守制，二年後再刻〈中堂銘〉、〈右堂銘〉、〈東崖銘〉。制滿，適顏真卿撫州刺史任滿北歸，乃邀來浯溪，楷書〈大唐中興頌〉，完成了一組摩崖石刻，成為浯溪重要地景，此後召喚歷代文士書家前來觀摩懷古，並於岩壁上持續留下摩崖詩文，發展成為壯觀的摩崖碑林。⁴⁹

浯溪位於永州祁陽縣南五里，湘江南岸，發源於雙井，流過渡香橋，北入湘

⁴⁵ 如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63。

⁴⁶ 請參見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2期（2009年2月），頁73-101。

⁴⁷ 請參見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

⁴⁸ 元結（719-772）字次山，號猗玕子、漫郎、聾叟，河南魯山人。天寶十二載（753年）進士。曾參與抗擊史思明叛軍，立有戰功。唐代宗即位後，為著作郎，後任道州刺史，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所至皆著政績。逝世後，追贈禮部侍郎。參見顏真卿撰：〈唐故容州都督兼禦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並序〉，（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143。

⁴⁹ 據統計，浯溪摩崖碑林面積達56000平方米，分九個碑區，現存歷代詩、銘、賦、文摩崖石刻505方，其中唐代17、宋代116、元代5、明代84、清代92、民國9、時代不明者182方。

江，異石特出，懸崖十仞，⁵⁰元結愛其山水，結合形勝，修築簡單居所。〈浯溪銘〉、〈岵臺銘〉、〈唐頤銘〉分別以水、石、建築爲主體作銘，勾勒浯溪園亭的大概景觀。〈浯溪銘有序〉云：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口。銘曰：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巖雙石。臨淵斷崖，夾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⁵¹

此銘刻於大歷二年（767）四月，文中先說明整體環境，特別聚焦於浯溪與湘水交會處，二水交會處並非平沙淺渚，而是山崖聳峙，溪流穿過山崖，如開石門，形成臨淵斷崖，夾溪絕壁的景象，溪流自爾潺潺，而雙石自爾特立，景象十分特殊。元結見其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無人整治，亦無專稱，遂命名曰「浯溪」，表達爲吾獨有之意，並刻石立於溪口。

〈岵臺銘有序〉云：

浯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涯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礪礪，半出水底，蒼

⁵⁰ 浯溪地理方位參見諸本方志記載，如（明）姚暉重修，林華校正：《（弘治）永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64），卷2，頁16a-b，總頁117-118。（明）史朝富、陳良珍纂修：《（隆慶）永州府志》（臺南：莊嚴文化，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201，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刻本），卷7，頁34b，總頁617。（清）劉道著修，錢邦芑纂：《（康熙）永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九年刻本），卷8〈山川志〉，頁22b，總頁219。

⁵¹ （唐）元結：〈浯溪銘有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卷10，頁151-152。（清）董誥等輯：《全唐文》作〈浯溪銘並序〉，卷382，頁15a-15b，總頁288。其中「溪古荒溪」《全唐文》作「溪古地荒」較宜，本文從之。

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歆竇，宜閒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台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岵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深，岵臺隋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市，羈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厓礪琢，如瑾如璫。作銘刻之，彰示後人。⁵²

此銘刻於大歷二年（767）六月十五日，元結持續發現浯溪一帶水石相濟之美，岵臺為浯溪東北的一座小石山，山勢峭拔，崖壁懸絕。而向水一面修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接洄潭。石山部分延伸入水，上下景物經折射作用，在水光搖曳間游移浮泛，別具美感。此磴道當是元結所修，以便於建設與遊覽，在其規劃中，山上景觀勝絕處則建亭堂，峰石坎陷低窪處則種松竹等植栽，可以登臨遠眺與逗留。而後再轉出古人登高多懷憤悶愁怨，反襯自我純好乎山水，推敲銘意，似也有勸喻後代士人或懷憤悶者，亦可來登此臺，一縱心目，善加排遣。

次年，元結陸續有新的建設，作〈唐廡銘并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回四十餘步。西面在江中，東望岵臺，北面臨大淵，南枕浯溪。廡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廡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廡，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唐廡，愜心自適，與世忘情。廡傍石上，篆刻此銘。⁵³

⁵²（唐）元結：〈岵臺銘有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 10，頁 152-153。（清）董誥等輯：《全唐文》作〈浯臺銘並序〉，卷 382，頁 16a-16b，總頁 288。

⁵³（唐）元結：〈唐廡銘并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 10，頁 153-154。（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382，頁 15b-16a，總頁 288。

此銘刻於大曆三年（768）閏八月九日，由林雲鑄石。唐頤位在岵臺西偏的山石上，此石體量小於岵臺，然花木扶疏，視野開闊，傍山近水，暑熱時有清風，霜寒時有朝日，適宜起居棲遲。元結刻銘石上，表明將家居於此的心意。元結所構居室可知者有中堂、右堂，右堂作為客房，中堂自居，坐南朝北，以示不忘故土。皆有銘文，唯〈中堂銘〉已佚，〈右堂銘〉僅存殘句。另為岵臺西面之山崖單獨撰銘刻石，稱賞其敲危高迥，每當亭午時，提供清陰，下可行坐八九人，亦可容枕席安憩。以其在唐頤之東，故命名東崖。

元結整治了浯溪、岵臺、唐頤、中堂、右堂、東崖等景象要素，可謂擁有了一座溪畔小園，特別的是，他一一撰銘刻石，又從道州移來〈窳尊銘〉、〈窳尊石〉刻石，數年後更將〈大唐中興頌〉鑄刻於岵臺崖壁，逐步強化了刻石作為此園景象主體的地位，同時也召喚了來遊者持續以刻石進行對話，多重行動先後層疊，終而形塑了浯溪的地景，下文嘗試以發現、命名、銘刻、對話加以疏理。

（一）發現：彰顯被隱蔽的水石細節美感

從體量和形勢上來看，岵臺等石山承衡山之末勢，固不能比擬衡山之崔巍；浯溪作為湘水支流，恐亦難以比擬湘江之浩渺。然元結之於浯溪，不同於一般遊客之偶一過臨，視之為旅遊途程的驛站之一。他走近浯溪與湘江匯流之處，一遊、再遊、乃至五遊其地，⁵⁴進而築臺建頤，摩崖刻石。這條無名的小溪，以鮮麗的空間景象充滿元結的視野，獲得他真誠的情感，成為獨立而不可被取代的唯一之地。⁵⁵在元結逢識前的小溪，世無名稱，何以無名？因為未被注目，美景被遮蔽。直到元結發現此地山川之美，細察其山石崖壁之巉峭、風煙水波之清曠，也才能注意到「臨淵斷崖，夾溪絕壁」、「其勢礪礪，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小峰歎竇，宜間松竹」等獨特景觀與細節。元結其他景觀記銘文有時也

⁵⁴ 桂多蓀編：《浯溪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1。

⁵⁵ 蕭馳指出元結、柳宗元「親暱空間上更小的人間山水世界的話語特徵」，泉石或水石取代山水成為興趣所在，文中分析元結嚮往山水中一個自我涵攝的棲居小天地，精彩可參。蕭馳：〈從「山水」到「水石」：元結、柳宗元與中唐山水美感話語的一種變化〉，《中正漢學研究》24期（2014年12月），頁293-332。

標記了這種發現的樂趣和自矜，如〈寒泉銘并序〉的「惜其蒙蔽，不可得見」，⁵⁶〈七泉銘并序〉的「此邦豈世無好事者邪，而令自古荒之」？⁵⁷〈右溪記〉的「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⁵⁸〈朝陽巖銘并序〉的「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⁵⁹元結宦旅各地，對於這些溪泉巖洞之美的發現，始終樂此不疲，對於美好景觀無人賞愛，亦不免徘徊惆悵。此類人地遇合關係，已開啓柳宗元〈永州八記〉之先聲，但如上舉諸文，元結文字表述頗爲簡約，情感抒發亦相對淡薄，其中深情與意義的發揮，仍等待柳宗元的到來。

（二）命名：強調「吾」與山水的聯結

元結十分清楚自己與浯溪關係的獨特性，「爲自愛之」，遂通過命名加以彰顯，「旌獨有也」，強調「吾」與此地山水的聯結，故制字「浯」、「晤」、「唐」，爲三吾命名。（宋）陳衍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爲浯溪，因山以爲晤山，作室以爲唐亭，三吾之稱，我所自也。制字從水、從山、從广，我所命也。三者之目，皆自吾焉，我所擅而有也。」⁶⁰指出三者皆從「吾」得其聲義，水、臺、頤皆「吾」所發現、創建、制字、命名與擁有。命名帶有賦予意義、辨識身份與擁權權力的多重性意涵，通過命名，浯溪系列水石建築獲得了與元結緊密聯結的親密關係，與其他空間得以明確劃分區辨，同時，這些水石建築也階段性地爲元結所擁有。所以言其爲「階段性地擁有」，不單指物理性空間所有權難

⁵⁶（唐）元結：〈寒泉銘并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 10，頁 159。（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382，頁 17a，總頁 289。

⁵⁷（唐）元結：〈七泉銘并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 10，頁 1147-148。（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382，頁 19b-20a，總頁 290。

⁵⁸（唐）元結：〈右溪記〉，（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 10，頁 146。（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382，頁 2a-2b，總頁 281。

⁵⁹（唐）元結：〈朝陽巖銘并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 9，頁 143-144。（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382，頁 21b-22a，總頁 291。

⁶⁰（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楚遊日記〉中記遊浯溪引述陳衍之語，頁 211。文中之「唐亭」即指「唐頤」。

以長期持有的問題，元結「命曰浯溪，旌我獨有」的作為，並不以「獨有」為終始目的，而同時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的期待，這也是他進行空間景象之命名每每結合刻石行為的深意，下文將再說明。三吾的制字命名既見「自愛」的別趣，也流露「獨有」的傲氣。⁶¹此種造字命名手法亦見於前此在道州東郭發現七泉之命名，元結因「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的道德理念，而以漣、澗、湫、沔、瀆命名五泉，⁶²已是浯溪系列造字命名的前驅。

就命名取義而言，元結的景觀命名大抵可分為三條思惟路線：一為人地的聯結，早期的「猗玕子」與「猗玕洞」，稍晚的「浪士」與「灑濱」，後來的「漫郎」與「漫泉」屬此，三吾亦是。二為德性的聯想，前云「七泉」中之五泉，「寒泉」的「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⁶³，「異泉」的時異、事異、理異⁶⁴屬此。三為景觀的相對位置，如「東崖」在「唐頤」之東，「朝陽巖」以其東向，可迎朝陽；「陽華巖」也因巖當陽端。整體而言，在唐代中期，園亭命名風氣初開，王維之輞川別業、杜甫之浣花草堂並未別置園林總名，輞川二十分景之命義單純樸素，稍晚之白居易具高度園林自覺，並未留意命名。在此時代背景下，元結的「三吾」景觀命名與柳宗元之「七愚」先後相呼應，透露出中唐景觀人文化的訊息，他們對環境的體認，在自然山水原本提供的形式內容之上，更披覆一層濃烈的個人色彩，人的意義籠罩滲透於該空間之中，使之脫離原本的鴻濛身份，成為具特定時空性質的地方。

⁶¹ 青年學者余珊儀就元結的空間命名文章進行考察，指出其創作概念是空間命名文章的源頭活水，後來文人或繼承其「道德教化」思維，或延續其「旌吾獨有」傲氣。於空間命名文類，具有「原創者」地位。余珊儀：《漫叟與浯溪--元結的空間命名文章及其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9年）。

⁶² （唐）元結：〈七泉銘并序〉，（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10，頁147-150。

⁶³ （唐）元結：〈寒泉銘〉，同前註，頁159。

⁶⁴ （唐）元結：〈異泉銘〉，同前註，卷6，頁85。

(三) 銘刻：個人情懷與公共議題的並置

元結頗熱衷於空間景象之命名與釋義，且多付之石刻。前此已有幾個系列的銘記，如隱於樊水期間，有〈杯樽銘并序〉、〈退谷銘并序〉、〈杯湖銘并序〉，主要由友人孟士源命名，元結爲之釋義，並銘之谷口以自警惕；另〈殊亭記〉、〈廣宴亭記〉爲朋友武昌縣令馬向所作，帶有應酬性質，付之刻石，可以更具體強化它們作爲禮物的性質，並發揮公告宣揚的效果。道州的〈七泉銘並序〉、〈五如石銘并序〉、〈灑溪銘并序〉爲自然水石命名，撰文刻石的活動，則有公告勸戒的作用，如「欲令圓者，飲吾泂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將戒來世，無忘直焉」、「我命泂泉，勸人事君」、「欲將斯泉，裨助純孝」⁶⁵、「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灑濱」。⁶⁶至於浯溪系列的篆刻諸銘，雖都標舉自旌自愛，作爲自我贈送的禮物，其實也都含有向朋友或群眾公告宣揚的意味。此一用意，可以從他刻意邀請書家、講究書體見出。〈浯溪銘〉由文學季康以玉箸篆書石；〈岵臺銘〉由瞿令問以懸針篆書石；〈唐廡銘〉由袁滋以鐘鼎篆書石，林雲刻；〈中堂銘〉由李陽冰篆書；〈右堂銘〉銘題篆書，銘文正楷，傳由高重明書石；〈東崖銘〉原書者已失考，今存者爲清末黃喬以篆體重新書鑿；至於原在道州移刻而來的〈窳尊銘〉和〈窳尊石詩〉亦由瞿令問以篆體書石。⁶⁷

元結浯溪刻石的活動在大歷六年邀請顏真卿楷書〈大唐中興頌〉到達高峰。〈大唐中興頌〉爲元結十年前之作品，歌頌安史亂後肅宗收復兩京，完成中興。文中有云：「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元結身經亂離，曾參與抗擊叛軍有功，上元二年（761）秋八月，亂平撰作此頌，可請允得其人，唯當時似未刻石。十年後，元結於頌文末增添六句：「湘江東西，中直浯溪，

⁶⁵ 分見（唐）元結〈七泉銘并序〉之〈泂泉銘〉、〈渣泉銘〉、〈泚泉銘〉、〈泔泉銘〉，（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卷10，頁148-149。

⁶⁶ （唐）元結：〈灑溪銘有序〉，同前註，卷6，頁90-91。

⁶⁷ 諸銘之書家與刻工，或附載於銘文前後，如〈浯溪銘〉、〈唐廡銘〉，或見載於《集古錄》等後人書錄，如〈窳尊銘〉。本文並參考桂多蓀編：《浯溪志》之考據，分見頁19、24、29、35-36、41-42、48-49、54。

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於千萬年。」鐫刻於嵒臺崖壁，下署「大曆六年（771）夏六月刻」。於是，屬於公領域中興大業的課題進入了浯溪，擴大了浯溪作為個人安家之所的意義，個人得以悠遊溪山，正因大唐中興，再一次歌頌了肅宗以來帝王的功業。

〈大唐中興頌〉加入了浯溪刻石，與〈浯溪銘〉、〈嵒臺銘〉、〈唐頌銘〉、〈中堂銘〉、〈右堂銘〉、〈東崖銘〉、〈窳尊銘〉、〈窳尊石詩〉同時並置，它們共同發揮多重景觀作用：一則配合浯溪諸分景進行點題，引導來遊者觀覽浯溪之自然水石與人為建築景象。二則刻石的物質性形式本身也成為景觀的一部分，它們刻於懸崖石壁，或者以活碑嵌置牆面，各有相殊的規模、精粗與位置，呈現不同書家刻工的書法和鐫刻藝術，自身就是景觀，而且是富含人文意蘊的景觀。三則將個人情懷與公共議題並置，提供遊人閱讀石刻的文本內容，解讀造園者的審美取向、人格特質，乃至對時代治亂的關懷，也喚起主人曾經經歷亂世、抗敵有功的記憶，重新回溯整個時代歷劫重生的歷史。元結藉由刻石的叢聚並置，展示了他豐富的生命與書寫面向，創造了前此未有的園亭景觀，也締造了浯溪新的地景。後人或行旅途經，或專程來訪，元結與這些摩崖石刻緊密聯結，成為觀看浯溪最觸目的地景。

（四）對話：開啓時間空間化的互文世界

浯溪石刻景觀初成，當地刺史王邕（天寶 10 載進士）即撰作〈後浯溪銘〉刻於石壁，與元結進行對話：

巋然吾台，枕於祈陽。迥然楚方，臨於瀟湘。
孤標一峰，不止百尺。嵯峨巨峻，□潔堪礪。
英才別業，雅有儒風。河南元公，高臥其中。
位為獨坐，人不知貴。興愜茲地，心間勝事。……
我牧此郡，契於幽尋。刻銘山岑，敢告煙林。⁶⁸

⁶⁸ （唐）王邕：〈後浯溪銘〉，（清）董誥等輯：《全唐文》，卷 356，頁 18a-18b，總頁 662。

寫元結三吾所在山水形勢，臨於瀟湘，固是勝景，但更具特色的是高踰百尺的山峰，山壁平潔堪礪，可以銘刻。他以地方官吏的身份相呼應，撰銘刻石，參與元結以文字塑造地景的行動。稍後的皇甫湜（777-835）於元和五年（810）來遊，追懷元結文學成就，評論其得失，亦以徘徊於石崖前作結：「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⁶⁹當然，浯溪的建設也會隨時歲流逝而傾圮殘敗，元結季子元友讓（766-?）於元和十三年（818）由寶鼎尉假道州刺史，過浯溪，見景象荒廢，不禁生慨：「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剝苔看篆字，薙草覓書堂。」⁷⁰於是進行修復工作，且延江州司馬韋辭撰〈復浯溪亭記〉，羅洧書，共刻一石，嵌於〈大唐中興頌〉左崖，也以撰記刻石的行動賡續父親的心意。此後來遊者亦往往題詩題名於壁，逐代累增，共同形塑浯溪石刻景觀。⁷¹

入宋以後，浯溪刻石獲得更高的關注。歐陽修（1007-1072）《集古錄》跋〈岵臺銘〉云：「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跋〈唐中興頌〉云：「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並留意及石刻殘缺：「碑在永州，磨厓石而刻之，摹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多是傳摹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厓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⁷²《金石錄》、《宣和書

⁶⁹（唐）皇甫湜：〈題浯溪石〉，（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卷369，頁4150。亦見（清）王士禛《浯溪考》，收錄於（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雜著之十三，「皇甫湜詩」，頁4434。

⁷⁰（唐）元友讓：〈復游浯溪〉，（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58，頁2882。（清）王士禛《浯溪考》，收錄於（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鬢」作「髻」，頁4446。

⁷¹舊傳唐代已有《浯溪志》，但不知纂者，宋代李仁剛、綦光祖曾撰集歷代石刻，清初已失傳。明人亦續有《浯溪志》、《三吾小志》等之編輯，（清）王士禛不滿意當時流傳志本，認為「總雜汎濫，至不可耐」，遂雜考新舊《唐書》與唐宋以來諸文獻，成《浯溪考》二卷，（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雜著之十三，頁4413-4452。其後續有（清）宋溶《浯溪新志》（台大館藏清乾隆38年（1773）原刊本）等，民國桂多蓀編《浯溪志》，蒐羅益富。本文討論元結以降石刻，即以王士禛、宋溶、桂多蓀之本為主要依據。

⁷²（宋）歐陽修撰，鄭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北京：人民美術出版，2010年），頁158。（清）王士禛《浯溪考》，收錄於（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頁4418、4421-4422。

譜》亦皆載錄。⁷³除了從金石角度載錄外，黃庭堅（1045-1105）更以〈書磨崖碑後〉開啓懷古議論。徽宗崇寧三年（1104）黃庭堅謫遷宜州，途經祁縣，泛舟浯溪，裴回碑下，「想見其人，實深千載尚友之心」，以楷書題碑崖下：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
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
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
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
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⁷⁴

首段寫年邁的自己終於來到浯溪，聚焦於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拉出極大張力，清楚指出墨本與石刻的差異，親臨現場，摩挲石壁，具體粗糙的觸感，呼應剝落殘蝕的字跡，與斑駁掩翳的蒼苔，召喚出強烈的時間感，扶藜霜鬢而遭貶謫的個人際遇，疊合著前朝顛危亂離的歷史滄桑，二者交相滲透，是以詩人面對斷崖蒼蘚，根觸萬端，低迴不已。詩中議論玄宗的前期行事與後期處境，以及肅宗即位靈武是非問題，揭示元結、杜甫忠臣之心，隱然含有對當前政事的隱憂，引發了當時與後代的持續討論，張耒（1052-1112）、秦觀（1049-1100）、潘大臨（生卒不詳）、李清照（1084-1155？）、陳與義（1090-1138）、陳從古（1122-1182）、楊萬里（1124-1206）、張孝祥（1132-1169）、張栻（1133-1180）等俱有讀〈大唐中興頌〉碑之詩文，展開與元結、顏真卿、黃庭堅之對話。宋室南渡前後，諸人過浯溪，「削苔讀碑，慷慨吊古」，追憶玄、肅間之國勢與人事，讀碑文而悲興廢，思古人而感時事，尤其別具懷抱。⁷⁵

⁷³（清）王士禛《浯溪考》，收錄於（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頁4422。

⁷⁴ 同前註，頁4438。

⁷⁵ 張蜀蕙曾指出歐陽修、黃庭堅對〈中興頌〉碑的意見，有著提領宋人閱讀此一文本的作用，進而探討宋代地誌書寫與閱讀的問題，參見張蜀蕙：〈誰在地景上寫字——由〈大唐中興頌〉碑探究宋代地誌書寫的銘刻與對話〉，《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5.2期（2010年9月），頁29-76。

明清文人亦大抵順承宋人而開展，元結的古雅碑文，顏真卿的蒼勁書體，緊密縮結兩人的生命性格、時代關懷與歷史興衰，訪讀古碑彷彿親臨歷史現場。藍澗詩「凜然抗賊氣未衰，長戟大劍紛離披」，結合元、顏兩人忠義之氣與字體。⁷⁶沈周詩「此碑頌德實揭過，有家有國留箴規」，直指元結批判肅宗、垂鑒後世之意。⁷⁷董其昌「有唐九廟隨秋煙，一片中興石不毀」嘆息唐朝之衰敗，「書生何負於國哉？元祐之籍胡為來？」則轉而批判宋朝之貶謫賢臣，以致「子瞻飽喫惠州飯，涪翁夜上浯溪臺」，最後收以「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以自嘲方式叩應上文。⁷⁸王士禛得碑文拓本，由字跡感受「芒寒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同樣回顧安史亂事，不同的是，他不取「頌德實揭過」的觀點，而以正面歌頌角度解讀，聯結他效忠清朝的立場：

昨者劇賊亂滇海，盜據衡永為根基。太平祭告遍群望，山川一洗無磷緇。
宜有雄詞繼前代，磨厓重刻浯溪湄。⁷⁹

隱然以三藩之亂比擬安史之亂，後者之擾攘對唐帶來幾近亡國的傷害，前者則快速平定，對清則是新政權的鞏固，愛好題石的王氏以「宜有雄詞繼前代」自許，「磨厓重刻浯溪湄」，重刻新詞，刮除原碑舊刻的文字與詮釋，重寫今日浯溪地景的意義。王士禛觀看歷史，調整了角度，翻過了一頁。

上文所述元結經由系列發現、命名、書寫、銘刻的行動，使得浯溪由一曲自然山水變身為人文地景，尤其是〈大唐中興頌〉的加入，強化了人事歷史的臨場示現效果，唐代歷史的轉折彷彿駐臨在元結古雅的文辭、顏真卿雄樸的筆勢，乃至浯溪清麗的山崖水石之上，等待來遊者前來讀取與對話。而諸多對話也相繼磨刻上石，以不規則的方位次第佈列於浯溪崖壁，成為浯溪的空間景象元素，允許

⁷⁶ (清)王士禛《浯溪考》，收錄於(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頁4444。

⁷⁷ 同前註。

⁷⁸ 同前註，頁4445。

⁷⁹ 同前註，頁4446。

不同的訪客以相殊的導引路徑重新組織，閱讀到不同的人事風景，長期以來形成了浣溪磨崖繁複的互文世界。⁸⁰

四、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碑刻文本的景觀化與經典化

絳守居園池屬官署園林，位於古絳州（今山西省新絳縣），戰國時期名為汾城，隋文帝開皇三年（583）修建為絳郡，州城建於汾澮岸邊，傍丘沿嶺，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郡守衙門設在城西高垣上，園池即位於郡衙的北面，始建於開皇十六年（596），由內軍將軍臨汾令梁軌開創，從城北的鼓堆泉引來泉水，開闢十二道灌渠，大部分澆灌沿途田地，小部分流入當時郡守的牙城，經郡衙之後，流入街市和城郊，具有實用功能。就郡衙而言，引來的泉水從西北注入，形成一個大池，池的周邊以木石圍砌成駁岸，形成園池的雛型。隋唐以來，歷經各代官衙州牧的添建維修，成為今存最古老的園林。⁸¹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樊宗師任絳州刺史，政平訟理之餘，整治衙北園池，並自撰記文，刻於石上，為後世留存了有關創建歷史、山水佈局及當時橋亭建築等訊息。唯〈絳守居園池記〉行文僻澀，樊宗師自作簡單註解，讀者仍難以句讀索解。筆者嘗試參酌歷代注解掌握樊氏記文的內容大義，探討其行文風格的選擇以及記文與註釋者之反覆對話，指出他好奇摹古，有意選擇古奧的文體和自注形

⁸⁰ 李貴以黃庭堅〈書磨崖碑後〉為中心，論析黃碑的異文與互文，進而探討宋代浣溪書寫的文化背景與文史互文，每見精義。請參見氏著：〈地方書寫中的空間、地方與互文性——以黃庭堅〈書磨崖碑後〉為中心〉，《學術月刊》2014年第03期（2014年3月），頁27-36。

⁸¹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中有關絳守居園池之創建緣由、地理位置之描述，各家解讀大致相同；至於園池內部景象構作，則註說多所不同。本段描述屬前者，除樊文外，並參考陳從周主編：《中國園林鑒賞辭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絳守居園池」條，頁176。筆者另見「南蓮園池網」之「絳守居園池簡介」，內容相近，而南蓮園池位於九龍鑽石山，即以絳守居園池為藍本建造，不妨參見。〈唐絳守居園池簡介〉，南蓮園池網站（<http://www.nanliangarden.org/concept.php?id=99>），不知發表時間。（上網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1日。）

式，在碑記的傳統形式上，形塑奇特的文本視覺景觀，甚至有意將記文經典化，召喚後來者持續與此園池大地進行對話。

（一）〈絳守居園池記〉的空間鋪寫與人事議論

〈絳守居園池記〉起首簡述絳州之地理位置與歷史遺風，然後展開對絳守居園池空間景觀、人爲建設的鋪寫，大抵由北而南、由西而東爲序，至東南再迴旋北隄，再到西北與西岸，然後總括亭、陣、園地、池渠、草木，最後聯結與園池有關的人事事件作結。茲節引描述園中亭池景象之一段文字以見其概：

子午梁貫，亭曰「徊漣」，虹蜺雄雌，穹鞠覩蜃。礙很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薔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睎思」。……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扃護，霏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鶩渠曰「望月」。又東鶩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迴西。^③

筆者綜合諸家注解解說其景象如下：絳守居園池中有南北二橋貫連「徊漣亭」，似二道彎曲的虹蜺俯瞰蜃宮。池中點綴小山石，參差傲岸作勢，或淹淹然而出沒水中，或委委然而曲折積聚。土橋與岸邊有莎草、薔薇、蔦蘿等植物布生，翠蔓紅刺相互交織牽帶。橋往南迤邐而行，連接「井陣軒」，有「香亭」地勢略高，亭前正承接著太守寢居「睎思」之後。（刪略處爲園池西南「虎豹門」所繪圖畫內容的描寫，大致爲左壁有猛虎與野豬搏鬥，右壁畫胡人馴豹。）園池東南方設有「新亭」，「新亭」前又有「槐亭」，兩旁有大片槐樹環擁，蓊鬱扶疏，頗爲蔭涼，而渠水緣著池的西邊南流而來，再折東循著廊廡而去，那是可宴集與議事之處。水道再向東南流，跨過水道可達「望月亭」。再向東行，極池之最角落，

^③ 諸家注補斷句多有差異，本文斷句依岑仲勉先生〈絳守居園池記集釋〉一文爲據，引文見岑仲勉：〈絳守居園池記集釋〉，《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年），頁527-529。

有一座建在高處的「柏亭」，幾可摩雲。四周有蒼松、翠柏、綠竹、古槐相簇擁，顏色、品味十分和配。站在「柏亭」高點，可以遠望，見渠道從州西北之鼓堆引水入園，由高處落下形成懸瀑，然後迂迴由西往東南流來。

文末議論人事云：

池由於場，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幾附於汙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澗，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汙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⁸³

回溯隋煬帝大業元年（605），漢王諒造反，絳州薛雅和閩喜裴文安支持漢王，居西北高垣，發土築臺以拒隋軍，因此形成大池，這是園池歷史的一部分。但樊宗師認為園池始創更要推到開皇十六年（596），內軍將軍臨汾令梁軌有見於水旱為災，體察民情，遂從城北鼓堆引來泉水，開闢渠道，以供飲水灌溉，百姓咸稱便利。樊宗師提醒後人，有關園池歷史文化的記憶，應加上道德性的價值判斷，「則可」與「其可」的判斷選擇，彰明了樊宗師的儒家本懷。

（二）〈絳守居園池記〉行文風格的選擇

〈絳守居園池記〉出以奇特的構詞、文法，自唐以來，好奇者為之作注，可知者五家：（唐）王晟、（唐）劉忱、（元）趙仁舉、（元）吳師道、（元）許謙，其中後三家注文今日仍得見。前輩學者岑仲勉先生薈萃眾說，衡量輕重，作〈絳守居園池記集釋〉，集釋既竟，仍指出「記文除首末數段，文義較顯。其他任何一節，諸家句讀、注解，都罕有能令人完全滿意者，是知樊文之大不易讀。」⁸⁴

樊宗師與韓愈同時，其人品學問，甚得韓愈稱許，曾舉薦於朝。⁸⁵宗師既歿，

⁸³ 岑仲勉：〈絳守居園池記集釋〉，《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頁 541。

⁸⁴ 同前註，頁 541-542。

⁸⁵ （唐）韓愈：〈薦樊宗師狀〉言其「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事繫元和十二年（817）。（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 2189。

韓愈爲作墓誌銘，稱其詩文著作宏富，「文從字順」，且「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⁸⁶。依韓愈觀察，樊宗師性情謹潔和敏，遇物仁恕，著作文從字順，必出於己。但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⁸⁷以澀爲樊宗師文筆特色。樊氏詩文集今已不傳，難以檢證平素行文是否大多文從字順；留存少數篇章唯〈絳守居園池記〉最爲知名，則頗符合李肇評論。

（宋）梅堯臣〈寄題絳守園池〉詩云：「黑石鑄辭澀如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睛欲抉無聲形，既不可問不可聽。」⁸⁸歐陽修（1007-1072）《集古錄跋尾》「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條云：「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于如此！」⁸⁹都指出了此文之怪奇、僻澀，難以識讀。歐陽修曾至絳州登覽園池，另有詩云：「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⁹⁰設想其思欲有所獨創的創作心態，並回應韓愈「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的評論，指出樊氏有意學《書經》佶屈聱牙的句法。

樊宗師以怪澀的行文爲園池作記，宜配合當時文壇風氣觀察，韓愈〈進學解〉自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⁸⁶（唐）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 2640-2641。

⁸⁷（唐）李肇：《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卷下，頁 57。

⁸⁸（宋）梅堯臣：〈寄題絳守園池〉，（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 49，頁 880。

⁸⁹（宋）歐陽修撰，鄭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卷 9，頁 194。案：依吳師道等補注「附錄」孫沖〈重刊絳守居園池記序〉記載，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孫沖奉詔爲絳州通判，所見樊氏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摧缺」，次年（景德元年，1004）與當時太守耿君摩石別刊之，以傳其文。如此則歐陽修所見已是宋初重刻之園池記。

⁹⁰（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 41。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⁹¹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⁹²二人不顧流俗，提倡古文運動，皆曾揭櫫《書經》作為學習典範，樊氏與韓愈交善，歐陽修謂其「欲學盤庚書」，不失合理推測。兼以當時文士各欲自立，彰明個人風格，韓愈〈送孟東野序〉強調不得其平則鳴，舉出孟郊、李翱、張籍皆善鳴者，⁹³與〈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中稱許樊氏「放恣橫從，無所統紀」，「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實可並觀。

〈絳守居園池記〉果真以其不平順的文字引起世人注目，除了前述梅堯臣、歐陽修的評述外，另有更鮮明的批判，如趙明誠《金石錄》云：「昔之為文者雖務為新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為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⁹⁴對於宗師故為險怪，明白表達了困惑與批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指出韓愈墓誌稱宗師有《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篇，然今日只存數篇，蓋因「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為文而晦澀若此，其湮沒弗傳也宜哉！」⁹⁵認為樊氏詩文集未能傳世，是世人對其為文晦澀作出了裁判，表達了鄙棄的意思。

文獻失傳之機緣多端，並不足以論斷樊氏總體文風。不過，〈絳守居園池記〉之刻意怪奇，並未隱沒失傳。樊氏作記刻石，成為園池景觀之一，增加文本的能見度，實流露傳世的期待。以怪奇、僻澀的書寫策略，營造似可解而又難以識讀的效果，似有意向當代與後世文人發出邀請，邀請前來參訪園池景觀，比對記文

⁹¹ (唐)韓愈：〈進學解〉，(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1909-1911。

⁹²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34，頁2178。

⁹³ (唐)韓愈：〈送孟東野序〉，(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頁1464-1465。

⁹⁴ (宋)趙明誠：〈唐絳守居園池記〉，(宋)趙明誠著，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卷29，頁534。

⁹⁵ (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6，頁480。

之描述，進行一場雜揉文字與景觀的好奇之旅。而文字自身營造「句斷欲學盤庚書」的風格特色，喚起經書的聯想，也成為吸引遊覽者眼光的特殊文本景觀。

（三）〈絳守居園池記〉與注釋者的反覆對話

〈絳守居園池記〉附有樊氏自作注釋，示範般開啓了後人爲它作注的歷史。《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二·別集類》收有〈絳守居園池記〉，四庫館臣爲撰提要云：

臣等謹案守居園池記一卷唐樊宗師撰，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三家所注也。宗師始末具韓愈所作墓誌中，是文乃長慶三年宗師官絳州刺史，即守居構園池，自為之記，文僻澀不可句讀。董道廣川書跋稱嘗至絳州，得其舊碑，剔刮刷洗，見其後有宗師自釋，然僅畧註亭榭諸名，其文仍不盡可解。故好奇者多為之註。據李肇《國史補》，唐時有王晟、劉忱二家注，今並不傳。故趙仁舉補為此注，皇祐（應是皇慶）癸丑吳師道以為疎漏，為補二十二處，正六十處。延祐庚申許謙仍以為未盡，又補正四十一條，且謂宗師本記守居之園池，舊注兼守居言，故多誤。至順三年師道得謙之本，又重加刊定，復為之跋，稱校此文二十年，屢經竄易，亦未得為定稿。蓋其字句皆不師古，不可以訓詁考證，不過據其文義，推測鉤貫以求通。文僅七百七十七字，而眾說紛紜，終無定論，固其宜也。以其相傳既久，如古器銘，識雖不可音釋，而不得不謂之舊物，賞鑑家亦存而不棄耳。

彷彿樊氏的預期視野，「文僻澀不可句讀」召來了為他疏解文字的追隨者。自唐時即有王晟、劉忱二家注，今已不傳。然元人三家趙仁舉、吳師道、許謙注補留存，這些注解的文字先後相續，互相對話補正，為〈絳守居園池記〉尋求適當的詮釋，同時也為〈絳守居園池記〉持續創造話題，引起關注。如宋元之際劉壘《隱居通議》「樊宗師文」條下云：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

有？硯憂磊塊，類不可讀。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為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如此也。商盤周誥，信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以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為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⁹⁶

劉壘雖不喜〈絳守居園池記〉，認為此文充滿閱讀障礙，作意求新，殆近於怪，而非成就「奇古」的風格。但他仍參與進議論圈中，並且也以《易》、《春秋》、《尚書》等經書作為比較討論的對象。文中一方面反映出〈絳守居園池記〉在當時確有許多愛好者，「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的現象，一方面也不自覺地加強了樊文的名聲傳播。

所謂「篤嗜而不置」的極致表現，反映在反覆推敲校注的工夫上，吳師道可為代表。先是趙仁舉為樊文進行註解，吳師道不滿其蹊陋，於是為作十數條補正。並對樊文風格有所評述，〈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流露且評且譽的複雜評價：

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為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儂淺以資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翱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澁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兼之。……夫韓公之奇，奇之正者也；二子之奇，奇之偏者也。文章貴用意，不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為奇，而不能不奇之為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為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己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予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其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奧義缺文焉，彼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飾夷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均可見

⁹⁶ (元) 劉壘：《隱居通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5，頁153-154。

矣。彼解者疲情畢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⁹⁷

吳師道首先指出〈絳守居園池記〉是樊氏「蓄示詭異」有意之作，以折儂淺之弊。並將之繫屬於韓愈一系，以盧仝、樊氏之險怪奇澀與李翱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並置，安置其文學史的位置。然後分辨「奇之正」與「奇之偏」，批判樊氏有意為之，並推想其他詩文或者不盡如此。最後再指出樊氏之文刻意作奇，然仍留下線索，讀者細心尋繹仍可理解，只是往往「疲情畢力而猶惑焉」。這是吳師道的經驗之言，他先在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校補趙仁舉之注，七年後許謙接續補正四十一條，至順三年（1332）他又在許謙的基礎上重加刊定，校定此文先後二十年，自認仍未得為定稿，疲情畢力而猶反覆推敲，不忍釋手，吳師道細膩地剖示了愛好者複雜的閱讀心態。

這是樊宗師的過人之處，也是〈絳守居園池記〉的魅力，文本結合石刻的形式，矗立在園池中作為景觀之一，險怪奇澀的行文自身即是一項特殊的觀賞物件，召喚讀者有關石經的文化聯想。而文本內容一方面追憶園池始建的前代歷史，一方面描述人為建設與自然植栽等空間景象。追憶歷史的時間深度有助於讀者接受他古奧的文風，而所述的空間景象則是樊氏對此古園的整治現貌，提供了一種可以歷遊驗證的踏實感。遊園者既可以視之為遊覽指南，也可以反向操作，以實景推敲文字，取得雙向互詮的趣味。於是自唐以來，〈絳守居園池記〉的特殊形態引起大量文士的注意，除唐代韓愈、李肇等同時文士外，宋代歐陽修、梅堯臣、趙明誠，元代劉壘、吳師道、陳振孫，明代宋濂、薛瑄、陸深、胡應麟，清代錢謙益、方以智、顧炎武等具代表性之文化人士，皆曾因此一文本或石刻而作議論，當代重要學者岑仲勉先生亦有〈絳守居園池記集釋〉，為之詳作疏解，凡此皆可見出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之書寫與刻石所引起的巨大迴響。他的石刻記文記存了隋代始建園池的時空記憶，從而也創造了中唐以來絳守居園池新的文化記憶。

⁹⁷ (元) 吳師道：〈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絳守居園池記注》（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影印己未紹興樊氏重雕弘治刊本），頁19a-19b。並見於（元）吳師道：《禮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卷16，頁5a-6a，總頁226-227。末句《禮部集》作「則樊子豈非過情者哉」。

五、結語

北宋的李格非隔著時間的距離與戰爭的煙塵，回顧唐代的園亭建設，不勝滄桑變異之慨：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⁹⁸

園亭的頹敗與人事的消散是一體之兩面，中國傳統園亭建築多以木竹為材料，往往體量較為輕巧，易於衰朽頹敗。景觀的維護同時須兼顧人為和自然要素的養護與整治，隨著人事的起伏變動，若無後繼者持續投注心力、物力等維護，可能數十年間，已然井斷垣頹、草深苔碧，景象結構崩解，或者犁為良田，樹為桑麻，或者僅存廢園殘景，以供後人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罷了。就水石與草木的個別存在而言，他們從作為園亭的局部景象結構解散出來，重新回歸大自然的一部分，水流石立、樹老草長，自走著各自的生之歷程，而就其曾為園林而言，則是無情宣告著園亭生命的死亡。

從這個角度來看園亭立碑刻石與重修復刻的行為，以石材對照木竹材料的短暫性，使得立碑刻石的行動也帶有一份預想頹敗的悲涼，彷彿因為預見了園亭終將頹敗的命運，而預先為它立了墓碑，寫作碑文。以碑石的物質形式和文本內容來紀錄一段人文的作為和情志，期待藉由石材的相對永恆性、石刻文字的相對莊嚴性，以及文字文本展現的內容與形式特質，持續召喚後繼者前來養護、追悼，縱使不能維護整體園亭景象於長久，或能維護這從過去的網絡中剝落下來的一小截斷片，然後在被審視的當下遙指過去，指引著追憶昔日園亭相關時空人事的作

⁹⁸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年）史部地理類七「古蹟之屬」，頁11a。

用。

文化地理學者研究地方中觀念與物質、實踐與地方、文化與空間如何關聯等問題。認為地景反映了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是一套具有象徵意涵的表意系統，也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並以中世紀的書寫材料羊皮紙為喻，指出地景是一張不斷刮除重寫（palimpsest）的羊皮紙，是連續的發展過程，也是分解與取代的過程。⁹⁹在唐代的大地上，各項公共工程建設與私人興造曾經相互輝映，共創當時各區域的繁華地景。園亭作為當時處理人與自然山水關係的新形態，雖終究只是短暫興頹的過程，也參與進地景模塑的歷史，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刻痕。前述園亭中的文字撰述和付之碑刻的行為，可以說都是在地景刮除重寫的過程中，企圖刻鏤下更深刻印痕的努力。在這些努力中，傳述了他們對於人生過程的思索與回應，也透露對於歷史進程的預想，一方面有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的通達，一方面也有知其不可而猶為之的莊嚴。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毛亨注，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唐）元結撰，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

⁹⁹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年），頁18、27-28。

-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唐)韓愈撰，(宋)魏仲舉輯注：《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 (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唐)李肇：《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
-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宋)歐陽修撰，鄭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
-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年）。
- (宋)趙明誠著，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
- (宋)朱熹集注：《楚辭集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 (元)劉壎：《隱居通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元)吳師道：《絳守居園池記注》（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影印己未紹興樊氏重雕弘治刊本）。
- (元)吳師道：《禮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
- (明)姚昺重修，林華校正：《（弘治）永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64）。

- (明) 吳訥：《文章辨體》（臺北：泰順書局，1973年）。
- (明) 徐師曾：《文體明辨》（臺北：泰順書局，1973年）。
- (明) 茅坤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83冊）。
- (明) 史朝富、陳良珍纂修：《（隆慶）永州府志》（臺南：莊嚴文化，1996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201，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刻本）。
- (明) 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清) 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清) 劉道著修，錢邦芑纂：《（康熙）永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九年刻本）。
- (清) 夏之蓉：《半舫齋古文》（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9輯
26冊，影清乾隆刻本）。
- (清) 夏之蓉：《半舫齋編年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
287，影印清乾隆36年刻本）。
- (清) 沈大成：《學福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1428，影印復旦大學館藏清乾隆39年刻本）。
- (清) 楊楚枝修，吳光纂：《（乾隆）連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廣東府州縣志》第六冊）。
- (清)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1454，影印清刻本）。
- (清) 李調元：《童山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
- (清) 董誥等輯：《欽定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
第1642冊）。
- (清) 程頌萬：《楚望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1557，影印復旦大學館藏清光緒27年刻本）。
- (清)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清)宋濂：《浯溪新志》(台大館藏清乾隆 38 年(1773)原刊本)。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 年)。

朱劍心：《金石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 年)。

李慧、王曉勇：《唐碑漢刻的文化視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桂多蓀編：《浯溪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 年)。

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年)。

陳從周主編：《中國園林鑒賞辭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葉國良：《石學蠡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漢寶德：《物象與心境——中國的園林》(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0 年)。

(二) 期刊論文

岑仲勉：〈絳守居園池記集釋〉，《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 年)，頁 523-542。DOI: 10.6355/BIHPAS.194810.0523

李貴：〈地方書寫中的空間、地方與互文性——以黃庭堅〈書磨崖碑後〉為中心〉，《學術月刊》2014 年第 03 期(2014 年 3 月)，頁 27-36。

金其禎：〈唐代碑文化研究〉，《南方文物》2004 年第 3 期(2004 年)，頁 49-60。

張蜀蕙：〈誰在地景上寫字——由〈大唐中興頌〉碑探究宋代地誌書寫的銘刻與對話〉，《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5.2 期(2010 年 9 月)，頁

29-76。

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2期（2009年2月），頁73-101。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DOI:10.6141/TW-SRDA-D00078-1

許東海：〈風景與焦慮：柳宗元永州所撰山水遊記與辭賦之對讀〉，《政大中文學報》NO.1（2004年06月），頁75-112。

程章燦：〈從碑石、碑頌、碑傳到碑文--論漢唐之間碑文體演變之大趨勢〉，《唐研究》第13卷（2007年），頁419-436。

程章燦：〈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學術研究》2013年第10期（2013年），頁127-136。

程章燦：〈景物：石刻作為空間景觀與文本景觀〉，《古典文獻研究》第17輯下卷（2014年），頁1-28。

蕭馳：〈從「山水」到「水石」：元結、柳宗元與中唐山水美感話語的一種變化〉，《中正漢學研究》24期（2014年12月），頁293-332。

（三）論文集論文

張蜀蕙：〈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述〉，收於《唐代文學研究》13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59。

（日）清水茂撰，華岳節譯：〈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收於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頁1049-1072。

（四）學位論文

余珊儀：《漫叟與浯溪——元結的空間命名文章及其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9年）。

（五）網路資料

〈唐絳守居園池簡介〉，南蓮園池網站（<http://www.nanliangarden.org/concept.php?id=99>），不知發表時間。（上網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1日。）

The Topographical Wri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Garden Stele Inscriptions in Tang Dynasty

Tsao, Shu-Ch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scriptions flourish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also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arden development. From the nobility estate, ther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main form of a literati garde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tele inscriptions in garden appear in material form and become a target of people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hose Inscriptions serve also to form landscape changes and meaningful topics for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how such inscriptions are written and interpreted tha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shaping the local living experience. From three representative cases,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three sets of interpretive issues. First, using Wang Zhong-shu's Yan-xi pavilion as an example, Han Yu's "Yanxi tingchi (An Account of Yanxi Pavilion)" interpreted the nature of Pavilions in specific places and estimate their central meaning. It is believed that Han Yu's writing and Wang Zhong-shu's building created the memory of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Yan Xiting and even Lianzhou. Next, we look at Yuan Jie's example about Wu Creek, observing how the scenery had been discovered, named, wrote and engraved in stone, to shape the landscape of the cliff stone. In

particular, the stele of “Datang Zhongxing Song (Appraisal for Tang’s Prosperity)” had also led to the continuous dialogue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se works form a world of intertextuality with multiple voices intertwined. Finally, using Fan Zongshi’s “Jiangshouju Yuanchi (Garden of Governor residence)”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discusses Fan Zong-s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garden in essay, monument and article style. Utilizing local history and landscape, Fan Zongshi’s article style created visibility to accentuate the garden and became a compelling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the area’s descendants.

Keywords: Inscription, topographical writing, Han Yu, Yuan Jie, Fan Zongshi